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论丛

粤地考古求索

——邱立诚论文选集

邱立诚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论丛

粤地考古求索

——邱立诚论文选集

邱立诚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选录了邱立诚先生关于岭南地区考古研究论文 43 篇,包括综合论述和专题研究,内容涉及面广,时代跨度大,资料丰富,区域性强。主要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岭南区域的历史文化、人文社会和古代地方风貌。

可供文物博物馆学、考古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地方史以及相关学科的文博工作者、研究人员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粤地考古求索:邱立诚论文选集/邱立诚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03-020629-9

I. 粤… II. 邱… III. 考古工作—广东省—文集 IV. K872.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1308 号

责任编辑:闫向东 张亚娜/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赵德静/封面设计:陈 敬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2 插页:4

印数:1—1 600 字数:740 000

定价:1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作者简介

邱立诚 男，1953年11月出生于广州市，祖籍广东省信宜市怀乡。华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毕业，研究馆员。1971年起从事广东省田野考古工作及文物保护工作，曾先后任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副队长，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第二研究室主任；现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理事，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编写出版（含合作编写）文物考古著作《澄海龟山汉代遗址》、《人类历史转折点——论中国中石器时代》、《珠海宝镜湾》等12部，发表考古报告、论文等100多篇。

序

春节前夕,邱立诚先生携带即将出版的考古文集来到我家中,嘱我为其作序。邱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于是我得幸先睹为快,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这本近五百页的书稿,同时也有了一些感想和收获。

书稿定名为《粤地考古求索》,选录作者撰写的有关岭南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论文43篇。编者按论文的内容分别归为综述、专题两个部分。论文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文献学探讨岭南古代历史,构筑岭南区域文化。文集涉及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两汉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时间跨度大,资料丰富、翔实,对于想了解岭南历史文化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读物。

考古求索,指的就是考古学者对考古学的不断探索。记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刚刚兴起,当时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给李季先生为首的考古组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并非叫人寻宝、挖宝,而是提倡一种不断求索的精神。从此,考古人培育了一种求索、探索的专业精神。

《粤地考古求索》告诉读者求索什么?读了文集,我把它大致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 (1) 求索粤地的人类起源;
- (2) 求索史前时期岭南文化的转折点——粤地中石器时代文化;
- (3) 求索粤地文明的发生、起源与发展;
- (4) 求索粤地百越时期文化交流与相互关系;
- (5) 求索粤地古代与周邻文化、中原文化的相互关系;
- (6) 求索粤地海洋文化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 (7) 求索粤地社会发展进程、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过程中接纳、吸收和融合的地方特点和创新。

此外,求索还包含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邱立诚先生1971年参加文博工作,从一名讲解员到文物考古工作队队员,从考古发掘领队到文博系列的研究馆员,经历了积极参与田野考古实践、艰辛的考古发掘磨炼;经历了勤奋努力、虚心学习的成长过程。由于他参与省内一系列重要遗址、墓葬的发掘,能力和业务得到了机会难逢的训练而迅速提高。他是共和国时代成长起来的考古学家,在同龄人中是出色的佼佼者。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邱立诚先生主持或参与完成省内一系列田野发掘报告,如《澄海龟山汉代遗址》、《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雷州窑瓷器》、《珠海宝镜湾》、《揭阳考古》等,他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最近十年,他陆续撰写了一系列有分量、有见解的研究论文,如《论广东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

化》、《英德牛栏洞遗址的初步研究》、《珠江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广东青铜文化的土著特色》、《对粤港地区青铜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论广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文化》、《百越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考古学证据》、《论浮滨文化》、《再论浮滨文化》、《揭阳出土陶器上刻划符号的研究》、《合浦——历史的选择》、《史前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器》等。在这批论文中,他提出了石器时代的“独石仔文化”和青铜时代的“大梅沙文化”、“西瓜岭文化”;又根据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发掘材料,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鲜明地提出汉代的龟山即为汉揭阳县治的看法。

对南方地区中石器文化的研究,他根据石器的制作方法、器类组合,不同地层的共存物划分,特殊器物,堆积物内涵,将广东境内一批距今 14000 ~ 8000 年间的洞穴文化定为中石器时代。他提出了“独石仔文化”的渊源与两广旧石器中晚期有密切关系,它的去向是走向丘冈、走向河谷、走向滨海岛屿的新石器文化。中石器时代人类对历史的贡献是“结束了一个旧时代——旧石器时代,并且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新石器时代”。

有关广东青铜文化的研究方面,从他所写的一系列论文可以得到如下看法:

- (1) 浮滨文化是广东最早的青铜文化;
- (2) 粤港 20 多个地点出土的铸铜石范,说明存在本地的铸铜业;
- (3) 土著特色(如人首柱形器)是广东青铜文化的主要成分;
- (4) 文化交流推动了广东青铜文化的发展,北面是通过楚文化及岭北越人影响岭南;东周时期吴越文化对广东越文化影响至深。

上述这些结论性的看法是切合到目前为止广东考古的实际,其中有的看法十分中肯。例如粤东地区的浮滨文化经过一论再论的深入探讨,广东早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已逐渐清晰起来。

综观邱先生的考古学论文,传统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已为其熟练掌握和运用自如。他在研究、分析遗迹、遗物、墓葬时,同时还采用比较考古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故能纵横开阖,穿梭于时空的隧道,超脱区域的局限,成功地驾驭考古资料。

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形成的历史不过 200 余年,田野考古方法和研究方法还有待不断进步。20 世纪新考古学对传统考古学的冲击就是一个实例。我们有洞穴、遗址、墓葬、大遗址和大城址的发掘经验,但也有许多方法需要探讨,例如水下考古、沿海沙丘遗址的发掘是否按一般遗址的地层进行发掘等。这里想谈一点关于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革新问题。田野考古的方法是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完善的,可以认为,如果田野考古发掘的方法是科学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类型学、地层学研究就会准确和成功,反之则可能导致错误的判断。20 世纪 80 年代,崛起的环珠江口考古发掘了一批沙丘遗址,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由于沙丘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干扰了地层划分和器物类型的清晰度和可靠性,混淆了时间界线。《对广东先秦考古研究的检讨》对深圳咸头岭遗址内涵分析时,将其与大屿山东湾遗址相对比,就基于地层不清的情况下,把它定在距今 4000 年以前,其上限相当于大湾文化晚期,这就是

由于受到出土层位和材料的不科学影响所致。应该说,咸头岭遗址虽经多次发掘,其地层与器物的关系并未获科学的解决。近年,咸头岭遗址进行第五次发掘(2006年);主持单位改进发掘方法,采用固沙发掘方法,保持了地层的稳定和准确,而且可以挖掘到真正的底层典型单位,保证了出土资料的科学性。咸头岭遗址的再研究让人十分兴奋,遗址年代跨度为7000~6000年,分为三期五段,早期I段的上限已出现彩陶,距今7000年,晚期V段,彩陶未衰,距今6000年。根据各期段的典型器物(彩陶、刻划纹陶)构建起环珠江口沙丘遗址的新标尺,令人耳目一新。邱先生显然也注意到这一点,2006年撰写的《史前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器》论文中已改变了以前的看法,认为咸头岭遗址一、二期均早于大湾文化,¹⁴C年代分别为距今6900~6500年、6500~6000年。

从邱立诚先生参加文物工作的青年时期算起,30多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广东大地。他所从事的职业已溶入其考古生涯之中。他不辞劳苦,勇于实践,努力求索,自强不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走上了考古学家的成功之路。南粤大地经过一批考古学家几十年的努力探索和研究,使得原本知之甚少、模糊不清、若明若暗的广东远古历史开始清晰起来。这其中包括有邱立诚先生的贡献和功绩。

1996年,我为邱先生出版的《澄海龟山汉代遗址》作序时,称赞他对粤东考古所作的贡献,写了些祝贺的文字。愿此次结集出版的《粤地考古求索》能成为邱先生学术跨越式前进的新起点。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是我省文物考古研究机构,承担着全省繁重的文物保护、发掘与研究的艰巨任务。研究所将本所成员的研究成果列为丛刊出版是对知识的尊重、对学术的尊重和对人才的尊重,更是对本所成员的一种关爱、扶持和鼓励,是一种高瞻远瞩的创举。

是为序。

曾 骐

2008年2月

于中山大学

自序

1971年我从广州市执信中学高中毕业，9月3日，被安排到广东省博物馆工作，迄今已有36个年头。从一个鲁迅纪念馆的讲解员，到成为文博系统的研究馆员，这期间虽有个人的勤奋努力，但更不应忘记这是多少老前辈指导帮助的结果，更是单位组织给予机会和培育的结果。在从事文博工作期间，我考取了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本科（1980~1985年），还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中南区文物干部培训班（1982年湖南长沙）、第四期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1988~1989年山东泗水、兖州）、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举办的第四纪地层与旧石器考古培训班（1984年北京周口店）。

1971年冬，我参加了由广东省博物馆吴振华先生主持的佛山澜石汉墓群的发掘，这是我从事考古工作的开端。作为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考古人员，我先后于1972年（广州、潮州）、1973年（曲江马坝）、1975年（曲江马坝）参加省文物干部考古培训班；1976年到陕西岐山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全国亦工亦农考古培训班现场会后，于1977年在曲江马坝参与举办广东省亦工亦农考古培训班。参加的重要考古发掘项目有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曲江马坝石峡遗址、饶平浮滨文化墓葬、阳春独石仔遗址、封开黄岩洞遗址等。1981年起，我参加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使自己对全省文物考古状况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使自己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1983年，我主持了广东省文化厅在揭阳举办的省文物干部考古培训班的教学工作。此后，陆续主持了罗定背夫山周代墓葬、五华狮雄山南越国长乐台遗址、大埔浮滨文化墓群、乐昌对面山墓群、东莞明代罗亨信家族墓、澄海龟山汉代遗址、普宁牛伯公山浮滨文化遗址和广西那满旧石器时代遗址等项目的发掘，从中获取了许多田野考古的实际经验，也为自己从事岭南考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我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学习，从实践中进步，在思考中发展，在理论上提高。对于我来说，考古已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在于兴趣，在于全身心的投入后所获取的责任感和满足感。人类历史的画面在考古资料的认知后得以丰富和展现，这就是考古的魅力之所在。在参加了一系列洞穴遗址的发掘后，我参与或主持编写了《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阳春独石仔遗址发掘》、《英德牛栏洞遗址》等报告，并撰写了《略论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广东洞穴石器文化考察》、《论广东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等论文。广东地区的先秦考古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在从事考古发掘的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如《珠江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对广东先秦考古研究的检讨》、《广东先秦考

古研究的新进展》、《广东青铜文化的土著特色》、《对粤港地区青铜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论广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文化》等。经过几十年的考古研究，广东青铜文化已形成初步的序列，虽然在年代与分期上仍有不同的意见，但两周时期广东进入青铜时代已成为共识。至于商时期的广东考古文化，也有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其为青铜文化的肇始阶段。这些观点都贯穿于我的几篇文章里。尤其是粤东的浮滨文化，是我考古生涯中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编写了《饶平古墓发掘简报》、《大埔古墓葬清理简报》、《普宁牛伯公山遗址发掘》等报告，又发表了《从普宁牛伯公山遗址谈起——兼析浮滨文化的有关问题》（与吴雪彬、曾骐合作），《论浮滨文化》（与曾骐合作）、《再论浮滨文化》等论文，逐步深化对这一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并进而对浮滨王国与古揭阳的关系、潮汕方言区的形成作了开创性的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我主持了几个汉代遗址的发掘，并对广东这时期的相关遗址进行调查，编写《五华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并考证其为南越国赵佗的行宫——长乐台；编写《澄海龟山汉代遗址》考古报告专刊，提出龟山遗址应就是汉代揭阳的县治所在地，推动了对汉揭阳县治的研究；对乐昌洲仔城址的发掘，证实其为南越国时期的赵佗城。汉以后的考古研究，我做得比较少，发表的几篇文章，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总体地说，我在考古领域里的研究还是很肤浅的，说不上有多大的建树，写成的这些文章，不过是学习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反映出自己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进程，期间也出现一些研究上的纰漏。现将集子奉献于学界，祈望得到各位学者的批评指正。

邱立诚

2007年9月3日

目 录

序	曾 骐 (i)
自序	(v)

一、综 述

珠江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3)
百越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证据	(14)
对广东先秦考古研究的检讨	(27)
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广东先秦两汉考古	(39)
广东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新进展	(47)
从封开地区史前期考古文化看广信作为岭南首府的历史背景	(65)
先秦两汉时期潮汕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73)
从文物考古资料探索潮汕地区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86)
古代潮人的海上交通	(100)
榕江流域考古文化初论	(107)
揭阳的远古与文明刍议	(123)
关于揭阳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	(132)
粤西“陶瓷之路”考识	(138)
澳门几个考古问题的探讨	(148)
略谈广东经济建设中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及存在问题	(156)

二、分 论

(一) 石器时代

广东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其文化	(169)
对广东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探讨	(178)
广东洞穴石器文化考察	(189)
论广东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	(200)
英德牛栏洞遗址的初步研究	(222)
史前农业起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233)
西江——岭南史前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240)
史前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器	(247)

(二) 青铜时代

从普宁牛伯公山遗址谈起——兼析浮滨文化的有关问题	(262)
--------------------------------	-------

论浮滨文化	(270)
再论浮滨文化	(283)
揭阳出土陶器上刻划符号的研究	(294)
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315)
广东青铜文化的土著特色	(322)
对粤港地区青铜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	(334)
论广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文化	(352)
(三) 秦汉	
对广州“秦代造船遗址”的疑义	(371)
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初探	(376)
粤闽地区汉代建筑遗址的研究	(388)
韩江流域两处汉代遗址的比较研究	(399)
潮汕地区汉代文化遗存的初步探索	(409)
从澄海龟山遗址论及汉代之揭阳	(424)
徐闻汉代遗存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解读	(434)
合浦——历史的选择	(445)
(四) 其他	
有关古广信的两项考古发现	(457)
南澳大潭宋代石刻小考	(462)
广东宋元时期瓷业的发展及与雷州窑的关系	(464)
明代罗亨信家族墓碑铭及罗亨信生平历史介述	(481)
附录 邱立诚著作目录	(487)
编后记	(499)

一、综 述

珠江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作为一条水系,珠江是西江、北江和东江及其形成的水网的总称。西江发源于云南,其主流浔江在广西梧州与漓江合流后始称西江;北江则发源于江西,主流为湓水,在韶关与武水合流后始称北江,北江与西江在三水汇合,主流南经磨刀门直入南海,支流则东去入广州与流溪河汇合成珠江;东江源于江西寻乌水,在龙川与利江汇流始称东江,流至东莞虎门而与珠江汇合。三江汇流后自虎门以南为珠江口,然后顺中国香港、澳门之间汇入南海。依附于山岭、河流而产生的岭南远古人类文化,历经十数万年而形成的区域文明,进而发展为今天的岭南文化,其间的发展历程发人深省。本文使用目前所知的考古资料,对这一区域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等相关问题作简要的论述。

一、珠江古代文明的起源

1. 西江与粤西南路地区的史前文化

西江地区的古代人类目前可以追溯到距今 14 万年前的封开垌中岩人类化石^[1],从西江流域的考古情况看,他可能是从云南元谋人以及广西百色地区的远古人类发展而来。西江流域众多的人类化石遗存为广东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提供了发展、演变的源头。这条古人类的西江走廊是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晚于封开垌中岩人的文化遗存是罗沙岩遗址^[2],包括第三层的石制品和第二层的人牙齿化石、石制品,距今年代分别为 4.8 万年和 2.24 万年。他们是西江古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更晚一些的是封开黄岩洞遗址和阳春独石仔遗址^[3],这两处遗址都以单面打击的砾石石器为其最大特征,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从其风貌看,与广西百色旧石器^[4]当属一脉相承。百色旧石器通过西江流域向东发展,在桂南一线留下相当数量的台地、贝丘遗址;而在桂东与粤西,则有相当多的洞穴遗址,这是地理环境所使然。

在此之后,穴居人类逐步走向江边河岸、平原谷地以及滨海、岛屿,形成了更为多样化的考古文化,同时也与来自各个方面的古人类文化相互交流,共同发展。

进入一万年以后,有两处遗址代表着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一是位于贺江边台地的封开簕竹口遗址^[5],其束颈或高领的绳纹陶器,与广西甑皮岩遗址的二、三、四期陶器极为相似,两者间应有密切的文化关系,有可能是年代早晚的传承演变关系。二是位于南海北部湾滨海的遂溪鲤鱼墩贝丘遗址^[6],其屈肢葬的埋葬习

* 本文是《与现代中国人起源有关的岭南史前文化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由(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资助。

俗,与广西甑皮岩遗址、顶蛳山遗址墓葬^[7]中显示的埋葬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遗址所反映的正是原始穴居人类走向江边河岸和滨海的足迹。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高要(今属肇庆)蚬壳洲贝丘遗址^[8],一批以屈肢葬为特征的墓葬正是前述者向东流布的反映,这时已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物质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泥质陶器以加彩绘为特色,是长江流域大溪文化南渐的影响,是大溪文化影响力向珠江口两岸移动所形成的彩陶遗存(大湾文化)的桥梁;而遗址所见的带孔石刀,多少可见来自华东地区同期文化(江苏北阴阳营遗址)的影子。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土著居民接收了来自北方地区的文化信息,其传播通道应是北江或贺江、漓江。

在粤西地区,反映从广西向东传播影响的考古文化还有大石铲遗存^[9],这种大石铲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其中心地区是在广西隆安一带^[10]。在粤西,最东的地点是肇庆、高要,可以说,这已是大石铲文化的外围地点了。

如果说,上述遗存多是反映了与西面的文化关系,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封开乌骚岭遗存^[11]则显现出来自东北面考古文化的强烈影响。乌骚岭遗存的墓葬小而密集,其坑穴形态与江西拾年山遗址并无二致,而随葬品中的陶三足器、石琮等,显示该遗存应属于石峡文化。推断封开一带的同类遗存均是石峡文化西渐而产生的地方类型。

2. 北江地区的史前文化

曲江马坝人头骨化石是广东最负盛名的一项考古发现,也是岭南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之一,头骨的特征中有西方人种的因素,故而被认为与西方有某种交流^[12]。马坝人头骨化石的出土地点还发现了晚期智人化石,可以认为是古人类在北江地区的演化和发展。

位于北江西岸的英德牛栏洞遗址使我们对岭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发展过渡有更多的了解。牛栏洞遗址有三个文化期,第一期是以打制石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晚期;第二期是打制石器与穿孔石器共存的中石器时期;第三期是打制石器与磨刃石器、陶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早期^[13]。这三期文化中的特征分别与阳春独石仔遗址、封开黄岩洞遗址以及广西甑皮岩遗址相对应,可见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属一个考古学文化。或可认为是这个群体其中的一部分自西而东移动的发展结果。不可忽视的是遗址中发现的水稻硅酸体,这是目前所知的岭南水稻的源头,对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英德史老墩遗址在北江东岸边的台地,与牛栏洞遗址隔河相望。这是一处磨制石器的制作场^[14],以相当数量未完全磨光的石斧为主要特色,其他磨制的有镞、凿、刀等。器种不多,加工多不够精细,从中隐约可见牛栏洞遗址磨刃石器的发展脉络。此外,遗址中出现的个别有肩石器,或多或少地折射出来自西樵山遗址所代表的有肩石器文化区的影响。

一项重要的考古成果是石峡文化^[15]的确认。曲江石峡遗址有四个文化期,其中两期属于石器时代。第一期以白陶为主要特征,与珠江三角洲含彩陶和白陶的遗存大体同期;第二期即为石峡文化,以三足陶器、圈足器与有肩有段石器、长身石钺、石琮

为基本器类组合。石峡文化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东至连平、和平及河源、揭阳一线,西及封开一带。无可否认,石峡文化与华东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有密切关系,但土著特点也很明显,如圜底釜、矮圈足罐、双肩石器。岭南与华东两类考古文化的结合构成了富有特色的石峡文化,正是解读岭南北文化通衢的钥匙。

3. 东江及粤东地区的史前文化

粤东的原始文化可追溯到揭阳的两件打制手斧形石器和南澳、丰顺的细小石器^[16]。揭阳埔田马头嶂与新亨老鼠山分别发现一件手斧形石器,其打制方法、形态颇具旧石器风貌,但年代未能确定。南澳、丰顺的细小石器以“人”字形凹刮器为特点,与“漳州文化”的同类石器属同一个考古学文化^[17],年代约在距今8000年以前。这是来自东面的考古文化向西发展的显示,而广州番禺飘峰山的同类石器正是其族群继续向西移动的遗留^[18]。

稍晚一些的潮州陈桥村贝丘遗址^[19],以打制的尖状器(蚝蛎喙)最具特色,还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骨器以及彩绘陶器。陈桥村的石器与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如香港蚝涌遗址、广西东兴遗址)有着许多共同点,这是相近的生态环境所形成。而陶器则有所区别,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反映。揭阳埔田宝山嶂等多个地点出有三足陶器^[20],是石峡文化影响的结果。但遗址的整体面貌不明,无法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从出土石器的情况看,有肩石器很少,说明受粤中地区考古文化的影响也较小。

文化面貌较为清楚的是普宁虎头埔窑址^[21]。这是一处烧造陶器的窑群。一座是竖穴窑,后壁有一条烟道;其他都是横穴窑,有火膛和火道,窑室也是竖穴形,顶部四个角略作方形,作为烟道。陶器均为印纹陶,纹样较多,以叶脉纹数量最多。器形则以矮圈足的罐类为最大特征。这处遗存多少反映了与粤中、粤北地区同期文化的关系,奠定了粤东地区向文明时代发展的基础。

4.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史前文化

这一地区的旧石器文化至今未能确认,但新石器文化却十分丰富。香港大屿山东湾遗址的第一期文化以一组打制石器为特征^[22],年代尚难论定。南海西樵山的细石器,年代可推定在距今7000年左右,它的渊源关系应来自于华北地区当无疑问,是远古人类迁徙岭南的遗留。

以香港大湾遗址命名的大湾文化^[23],是以含彩陶为特征的遗存,主要分布于珠江口两岸地区,遗址类型包括有沙丘与贝丘两种。沙丘类型的典型遗址有珠海后沙湾,中山龙穴,深圳大黄沙,香港大湾、春坎湾、大浪湾,澳门黑沙湾等^[24];贝丘类型的典型遗址有东莞万福庵、蚝岗^[25]。陶器以彩绘、划纹、镂孔为基本装饰的圈足盘最具特色;石器则以双肩石器为最大特点。就石器而言,与南海西樵山双肩石器制造场当不无关系。

西樵山石器制造场^[26]以霏细岩为主要原料,它的产品主要输出地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其影响则散布各地,但以向西为主,包括西江以至整个粤西地区,乃至海南。但

与广西区的关系则仍然不很明朗,广西似乎也是双肩石器的起源地^[27],它与西樵山双肩石器在时间上孰早孰晚,至今未有定论。在粤北,有肩石器与有段石器结合而成有肩有段石器。在粤东,有肩石器未能占领市场,而梯形石器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一直延至商周时期。

大湾文化的发展去向是深圳咸头岭与珠海宝镜湾一类遗存^[28],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则是数量不多的白陶与以多种刻划纹为代表的陶器。这类遗存的晚期已出现几何印纹陶,如叶脉纹、曲折纹、长方格纹等,与粤北的石峡遗址、粤东的虎头埔窑址具有相同的文化风貌。其中珠海宝镜湾、香港涌浪、三水银洲^[29]等遗址还具有或多或少的石峡文化因素,如数量很少的陶三足器、石钺。这是时代的特征,也是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

二、珠江古代文明的形成

1. 商文化南渐对岭南的影响

随着商王朝政治、军事势力的强大,商土也随之扩大。岭南虽然不属商土,但商文化的影响也渐见明显。一个最大的标志是,岭南地区的商时期遗址,陶器中普遍流行折肩器,这正是商代陶器的主要特征。黑皮陶器是北方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常见器类,它在岭南的出现,也是在商时期受岭北的影响、传播而来,虽然器物的种类与数量都不多,主要见之于豆、盘类,如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东莞村头遗址、佛山河宕遗址、高要茅岗遗址以及香港白芒遗址等^[30]。

作为文明标志之一的青铜器,岭南地区也是在商时期开始出现的,如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淇澳岛亚婆湾遗址等地出土的铸铜石范^[31],虽然对它们的年代尚有争议,但从岭南的商文化因素渐浓的态势看,青铜器在岭南的出现与制造是十分正常的事。诚然,岭南地区早期青铜器主要是一些小型兵器和工具,因为只使用石范来铸造,故未能铸造容器。青铜器的出现促使社会形态有了更快的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武装力量的加强,使得部落间的掠夺成为可能并日益频繁,越人“好互相攻击”也就由此而来。正因如此,石戈、石矛、石箭镞在此时较多地出现在岭南各个遗址也就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释。

2. 浮滨文化的确立

浮滨文化^[32]已进入青铜文明时期已是不争的事实。严格地说,浮滨文化的分布区并不在珠江流域,而在榕江、韩江、九龙江和晋江流域。它对珠江文明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浮滨文化有明显的商文化影响的因素,但它是通过江西吴城文化^[33]的媒介而接受的。浮滨文化的陶器可以分成两组:一组是有外来文化因素的施釉陶器,包括有大口尊、折腹豆、圈足壶等,长颈、折肩的大口尊有明显的商代二里冈风格,但与吴城文化的同类器更为接近;深盘、折腹、喇叭形圈足的豆则与江浙地区的豆类较为一致;一些壶类也具有商代青铜器的风貌,如觶形器。另一组是具有土著